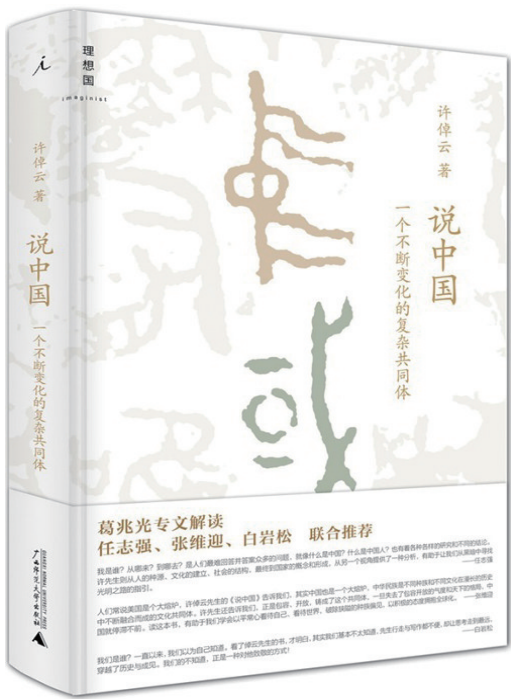


追溯一个国家形成的遥远历史



《说中国：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》
许倬云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中国是怎样形成的？这是一个众说纷纭，又总让人陷入思考的问题。许倬云先生以耄耋之龄，以《说中国：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》一书直面这个问题。他在谈到该书缘起时说，“‘我’究竟是谁？这个问题，不是一言两语可以解决的。”然而这又是一个不能面对的问题，因为“在这几千年来，世界第一次走向全球化的时代，我们审视自己的归属和认同，也审视族群归属和认同的原则，应是非常严肃的课题，庶几我们不被狭窄而偏激的族群狂傲挟持，迷失了自己往前走的方向。”

而只有认清自己的历史，才能“对自己有所了解，不至于产生大国沙文

主义，也会因此消除四周邻居的敌意”。从序言中可见，许倬云非常明确地表达了写作本书的意图，就是想揭示出一个“多元、多样”，而不是单一、固化的中国，通过这种多元性的呈现，消解掉一种故步自封的樊篱。

以此为目标，许倬云先生的写作思路就非常清晰：我们印象中中国历史由“秦汉……唐宋……明清”等正统朝代组成了一个朗朗上口的序列。而实际上，这里面没有一个“王朝”是可以脱离东亚乃至世界体系这个背景而独立存在的。

在本书的开头，作者就跃出了一般历史化的写作，结合分子人类学和考古学的最新成果，指出了中国这片

土地上的居民从最初开始，便是最早一批“外来者”的后裔。“‘现代人类’离开非洲以后，在五六万年前分批进入欧亚大陆。那些进入中国地区的人群，有一批是沿着太平洋海岸北上；另一批则是沿着东南亚和印度洋交界处，北上之后，有一部分折向西方，有一部分折向东方……”从头打破了国内学术界一直遮遮掩掩，不愿直面的中国人群来源问题。

既然从头开始，这片东亚大陆上的居民就以迁移方式开始了“中国”之旅，那么后来者便自然沿前人的脚步亦步亦趋地继续这一场旅程。虽然暂时没能提出夏人的起源，作者指出，商人是在不断迁移的过程中，由外而内地替代了夏人的统治，而“商人的老家应当是在渤海地区”，这就不是一般认识上东亚地理的中心区域。与之相仿，作者也指出了替代商朝的周人“本是居住在陕北、晋西的族群，毗邻河套地区”，他们也是通过迁移，南迁到了后来的关中地区，成为商朝的附从，随后开始了自己的勃兴。

由此可见，从中国文明史的开端以来，夏、商、周三代都是从东亚核心区的“外围”一点点内迁的，并不是一开始就以所谓的“中原”为根据地向外发展的。但这些王朝在东亚的核心地区站稳脚跟成功登基以后，就开始频频向周边发展，阻止其他民族像他们一样“由外而内”进占中原。同时为了在理论上建立阻止外族向内迁移的合法性，就建立了“华夷之辨”的修辞方式，封自己为正统，还把周边的人群称作“夷”，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主观的分类方式，因为这个“华和夷”并不是固定的，生活在中原的人们一方面阻止不与自己合作的“夷狄”进入；另一方面，又鼓励和自己保持密切文化、经济往来的人群加入自己，打开方便之门。这就是后来处在华夏边缘的秦国人主中原，成为正朔的原因。

如果说，那些由外而内的人群有着明确的移动、变迁过程，那么当“华夏”形成之后这一文化上的分野是否

就此固定下来，塑造了某种标准呢？答案同样也是否定的，在许多让晚近时代的中国人引以为豪的时代中，这种人口流动、文化融合反而表现得更加明显，而这种多元性甚至进一步促进了这些时期的繁荣。

书中对何为中国的具体论述，还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，比如人群与文化迁移的具体路线，其实是一个有趣的话题，和今天渐渐升温的“丝绸之路”研究也有着紧密的联系。以及，中国文化以南北而分的地理依据，都能让我们对这个“复杂共同体的形成”产生更具体、明确的认识。

此外，尽管书中重复了有些陈旧的话题，比如“假如中国北方草原上不是如此寒冷，那些东北和北方的胡人也不会大批地进入中国”——其实据当下掌握的气候史证据显示，古典时代气候波动的波谷与北方人群的南下时间线并不吻合。此外，这同样无法解释，那些北方草原上的居民本身又是从何而来，他们在先前又如何克服了当地寒冷的气候而没有发生迁移，偏偏选择了某个时期。

然而，这并不能掩盖许先生在书中力图呈现的一种卓有见识的，文化多元的观点，中国在历史上的发展和繁荣，并不是一姓一族的荣誉；同理，中国在历史上陷入的低谷，也不是某个民族取得政权的结果。中国在近代以来遭遇的现代文明的冲击，实在是“经过三个朝代五六百年的压制”堆积。

在中国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，了解“中国”的形成具有现实意义。我们已经明确，历史上的中国，从人口来源和文化上，就是一个和周边文化、世界其他文明，存在广泛而密切联系的共变区域，而不是一个巩固一隅的“文化孤岛”。那么在今天的时代，我们更没有理由刻意地将中国与世界、传统和现代对立起来，为了某些想象的历史荣誉感，将自己和当代的潮流分隔开来。我们需要明白，古往今来，中国都是这个不断变迁的世界的一部分，而这也是许倬云先生在书中给我们的启示。

(来源：新华读书)



《白夜》
作者：贾平凹
出版社：长江文艺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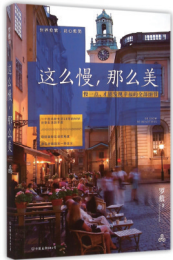
这是一本都市小说，小说里讲的是一个戏子的悲喜人生。在戏台上，夜郎可以任意驰骋，神鬼通吃；在社交上，夜郎也能够风生水起，上至达官贵人，下至市井小人都能把盏交欢。然而，看似风光的背后，夜郎却在自己的爱情和命运里，苦苦挣扎……



《杨绛传》
作者：罗银胜
出版社：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本书以温暖的笔触叙写了杨绛的百年人生，包括童年成长、家庭变迁、求学历程，以及同钱钟书半个多世纪相濡以沫的爱情，尽显其博学、睿智、宽容、韧性的名媛风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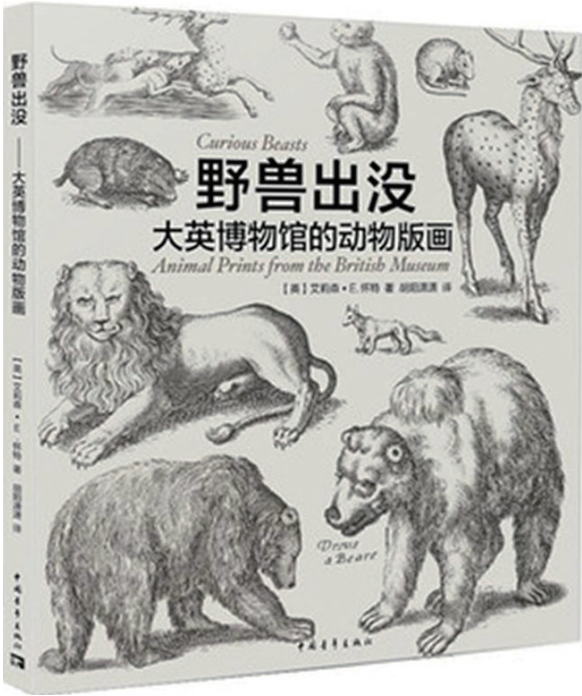
杨绛是一个从容优雅的精神贵族，她对抗战火、疾病、政治风暴、生离死别的态度，堪称生命的正能量。



《这么慢，那么美》
作者：罗敷
出版社：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许多人将全球幸福指数归结于北欧制度、福利、资源等因素，但真的仅仅是这样吗？北欧人的幸福感，更多来源于简约、自然、宁静的心态，以及家庭的温暖、个人努力，而这些是我们可以学会，可以身体力行的。

动物版画中的博物学



《野兽出没：大英博物馆的动物版画》
艾莉森·E.怀特
中国青年出版社

17世纪晚期，版画家范·霍夫画出了《著名的豪猪》，尽管只用于制作一场动物展览的宣传海报和纪念品，图像并不准确，但当时仍然向公

众传达出了“关于某种罕见动物”的诸多有用信息，如豪猪精巧的爪子、毛茸茸的腹部、浓密而带条状花纹的刺等。

包括这只“豪猪”在内，大英博物馆收藏了很多动物版画，这正是《野兽出没》一书的资料来源。这本书的主题是流行于15世纪至19世纪早期的版画文化中的动物形象。15世纪开始，人们逐渐对文字写就的动物寓言故事集产生了质疑，从而亲自研究动植物，随着美洲及澳大利亚这些“新大陆”被发现，探索的领域也越发宽广。这段时期直至摄影术发明之前，版画因其直观、能够复制的优点，成为记录、传播与动物相关的知识和观念重要的生产、传播方式之一。

在早期的动物版画中，版画家不只是关注动物的外表，更重视动物的文化内涵，动物很多时候被赋予道德角色。比如著名画家丢勒1504年创作的版画《亚当与夏娃》，就包含“深层的象征性含义”——“那只学舌的鹦鹉象征着动物的聪慧，可以令人联想到那条狡猾而又居心叵测地诱惑了夏娃的蛇。而公牛、驼鹿、猫和兔子则代表了不同的‘体液’——现代早期的欧洲人相信正是它们控制着人的身体健康。甚至右上角的那只小小的山羊都是人类原罪的象征，它正在堕落的边缘摇摇欲坠。”

其他版画里，猿猴代表着欲望、邪恶，山羊代表淫荡，熊代表愤怒，蝙蝠代表贪婪等。通过这些版画，人们得以不同程度地了解版画中的各种动物，惊讶于现代早期世界中奇特的动物形象，甚至还能表达公共看法。1557年首次出版的版画《大鱼吃小鱼》，高度写实却并不真实——画面

左边有长着人腿的鱼，大鱼张开的嘴中源源不断地游出小鱼——这幅版画，17世纪中期复制后，画面上强调了背后对于社会政治的看法：“富人用他们的权力来统治和压榨穷人。”

更多的动物版画，聚焦动物本身，比如对大象、蝴蝶、美洲蜈蚣等动物的观察、描述和刻画。这其中最富有博物学意味的是变色龙解剖图：17世纪，在巴黎举行了一场变色龙解剖实验。变色龙的构成，是在显微镜的协助下，用眼睛观察和检测到的。解剖者严格监督首席制版者的绘制及蚀刻过程，确保他们不会在任何阶段出错。“从细节上看，博物学家们似乎对变色龙的眼睛和长舌头尤其感兴趣：前者可以上下左右转动自如，后者则会在进食时猛伸出来。”

如果丢勒的“犀牛”仍然处于“艺术所允许的自由范畴内”，那么，1822年秋天，美国船长塞缪尔·依迪斯在伦敦展出的美人鱼，则与艺术没有半点关系了。船长声称这条美人鱼是在日本海域被活捉的；它下半身是鱼尾巴，长约60厘米，“甚至很多博物学家都相信它是风干的标本”。“绝好消息”很快被戳穿，这条美人鱼是伪造的：上半身取自一只母猩猩，下半身取自三文鱼，牙和顎部则取自狒狒。这一生物是如此引人好奇，讽刺版画创作者乔治·克鲁克香克为它绘制了一幅肖像，关于美人鱼的种种美好想象随之烟消云散——这，算不算一件另类的博物学作品呢？

(来源：新华读书)